

中國現代 文學研究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90 2

丛刊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 刊

2

1990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95461

作家出版社



1195461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张晓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九〇年 第二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50,000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350册

国内统一刊号：CN 11—2589 定价：3.50元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刊丛

1990年第2期（总第43期）

目 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十年（1979—1989） 樊 骏（1）

· 纪念“左联”成立六十周年 ·

“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

- 般夫诗的成就及其成因 林 奇（26）
浪漫主义向革命文学的过渡
——论创造社的转向 刘玉山（38）
论“普罗诗派” 柯文溥（48）
关于潘汉年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陈子善（62）

· 作家与流派研究 ·

- 鲁迅对佛教思想的二重选择 刘 密（67）
现实主义的象征：狂人？
——《狂人日记》综论 李铁秀（89）
中间物：胡适新诗理论的历史特征 董炳月（103）
新文学象征主义诗论探微 李 双（124）

• 文学史研究 •

知识妇女求解放的冲突与互补

——丁玲、冰心早期小说比较论 唐仁君 (138)

现实主义传统和作家的独创性

——茅盾与老舍小说比较考察 万平近 (153)

郭沫若与郁达夫的浪漫世界之比较 冯 奇 (170)

• 中外文学比较研究 •

平凡下边沸腾着现实的伟力

——夏衍和契诃夫剧作的比较思考 陈 坚 (187)

郭沫若与西方表现主义美学思潮 王世德 (197)

田汉与日本戏剧 刘 平 (209)

《茵梦湖》与《象牙戒指》 谢韵梅 (222)

• 短文选编 •

杂文家的窘迫和尴尬

——三十年代反杂文作家的“塞”与“行” 姜振昌 (229)

“解诗”：朱自清对中国新诗批评的贡献 许振敏 (236)

从郭沫若的血缘意识谈到

他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 周亚琴 (244)

无意流露的与有意追求的

——谈萧乾小说的特征 焦 俭 (252)

论《死水微澜》的语言美音乐美 刘 群 (259)

扬弃左拉的一个实际例证

——《蚀》的校勘手记 徐 学 (266)

艺术形式与深层意蕴

——从《五里雾中》谈“善构剧”的文本构成 林 蕉 (272)

• 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 •

东北沦陷时期的日中文化交流 [日]冈田英树著
陈 宏 译 (276)

• 书 评 •

一部有特色的作家比较研究著作

——读《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 黄侯兴 (283)

茅盾文学思想研究的新成果

——评《论茅盾的早期文学思想》 黎 舟 (288)

• 资 料 •

陈翰笙谈《现代评论》周刊 马光裕整理 (293)

钱端升谈《现代评论》周刊 马光裕整理 (295)

• 动 态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刘梦宇, 297)

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首届颁奖大会在北戴河举行 (李 彬, 303)

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综述(张新颖, 306)

• 新 书 林 •

现代文学思想鉴识(炳, 311) 《阿Q正传》研究纵横谈(炳, 312)

编后记 (313)

来稿须知 (31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十年(1979—1989)

樊 骏

1979年10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创刊时,在《致读者》中表示:“本丛刊创办的目的,是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阵地,以利交流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促进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提高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并且强调“鉴于过去对现代文学的各种复杂成分注意很少,研究很不够,我们希望今后不仅要注意研究文学运动、文学斗争,还要注意研究文学思潮和创作流派;不仅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大作家的研究,还要注意其他作家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还要研究民主主义作家,对于历来认为是反面的作家作品也要注意研究剖析;不仅要考察作品的思想内容,还要注意作品艺术形式、风格的研究。”当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号召的鼓舞下,历尽磨难、奄奄一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刚刚复苏,正在酝酿、萌发多方面的探索和突破,开始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在这样的历史性转折中,《丛刊》的创办和所确立的宗旨,表明它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意识到了作为一份学术刊物所应有的品格和所承担的职责,适应了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它所突出的探索、改革、建设的原则,也鲜明地体现了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整个民族中激发起来的意气风发地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时代精神。

十年过去了。在这段时期里，学术事业遇到了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各种困难。近三、四年，学术著作学术刊物的出版发行，更是陷入困境。《丛刊》也未能幸免：印数锐减^①，一再遇到经济“危机”，主编王瑶先生不胜感慨地用“蹒跚十年”概括这段历程^②。在这样的情况下，它顽强地坚持下来了，不改初衷地继续履行着自己的学术职责，虽然不能说所做的一切尽善尽美，事实上也的确有诸多亟待改进提高之处，十年的努力毕竟难能可贵，十年的成果也确实来之不易，理应得到格外的珍惜和认真的对待。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按照学术刊物的标准和要求，结合《丛刊》自身标榜的宗旨，对它这十年来的工作作个简略的述评。

《丛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③作为唯一的全国性的专门刊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它所发表的文章，大约占这门学科每年研究成果（不包括单本著作）的十分之一左右^④按学术质量较高或者有较大代表性的论文计算，所占的比重还要大一些^⑤。从这个意义上说，《丛刊》又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若干重要的方面，反映了整个学科的基本面貌和主要动向。评述这份刊物，不可能不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十年来的演变，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而作为解剖麻雀，又能反过来为理解和评价这门学科的进展及得失，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材料和依据。

① 创刊号的印数是3万册，1980年各期的平均印数为18500册，1985年降至8250册，1989年每期只印2750册。印数锐减的原因，在客观上由于各类刊物（包括学术刊物）品种增多，供读者选择的机会多了，购买和阅读的数量也就相应地分散了。从读者来说，书价上涨，限制了购买力。从出版者来说，在印数不多的情况下，印得少些可以少赔一些，也就不敢多印了。

② 参见《蹒跚十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

③ 1979—1984年，与北京出版社合编，1985年以来，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编。

④ 前几年，我们作过一些抽样调查，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章每年约有1000篇左右，《丛刊》的文章在100篇上下。

⑤ 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各种述评文字中，提到《丛刊》上的文章在所举的全部例子中，一般都占较大比重。

十年来，《丛刊》出版40期，发表965篇文章（其中研究性论文768篇，资料性文章197篇），共计1030万字^①。按照文章所涉及的内容分类，可以进一步看到如下情况：一、以作家作品为对象的文章有600多篇，占全部篇目的三分之二。有专文或者专节论述的作家（即不包括综论性文章举例提到的作家），约140人。最多的是关于鲁迅的，有129篇；其次是茅盾，62篇；以下的顺序为老舍43篇，郭沫若35篇，曹禺31篇，郁达夫27篇，巴金25篇，丁玲15篇，闻一多15篇，沈从文14篇，周作人14篇，叶圣陶12篇，赵树理10篇；5篇以上的，还有徐志摩、艾青、沙汀、朱自清、冰心、冯雪峰、夏衍、胡适、张天翼、胡风、萧红、戴望舒、张爱玲、许地山、王统照、萧军等人；只有1篇的，有60多人。二、着眼于文学社团、流派的文章约80篇，内中关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文学运动的，有30余篇；其次是鸳鸯蝴蝶派和创造社，各有10篇上下；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包括新感觉派、心理分析小说派），都有5篇以上；湖畔社、浅草社、现代评论派、京派、论语派等，也分别有1—2篇专文。三、从所研究的文学体裁来看，小说研究249篇，诗歌研究102篇，戏剧研究64篇，散文研究52篇；此外，研究作家的生活思想道路和文学主张的96篇，论述文学运动的53篇。四、根据文章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区分：关于第一个十年（包括“五四”文学革命）215篇，第二个十年244篇，第三个十年（相当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160篇（内中专门研

^① 需要说明的是：一、以上数字中，文章篇数不包括“论文摘编”、“动态”等栏目的篇什，总字数则将它们一并计算在内；二、本文的各项统计、分类原则和方法不一定完全合理贴切，具体数字也未经反复核对，难免有些小的差错，但就整体而言，作为原始材料，为了解刊物的基本面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究根据地——解放区文学的39篇)①。五、除了“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等经常性栏目外，这40期中随时增设的专栏，按作家区分的有鲁迅研究7辑、老舍研究4辑、郭沫若研究3辑、茅盾研究2辑、巴金、郁达夫、冯雪峰、闻一多、张天翼研究各1辑；以历史事件、文学运动作为栏目的，纪念“五四”1辑，纪念“左联”6辑，有关抗战文学的3辑，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辑，按文体分的，关于诗歌的5辑，关于剧作的3辑，关于散文的2辑，关于小说、通俗文学的各1辑，关于文论的4辑；此外，还有思潮流派、社团研究5辑，比较研究5辑。以上五组数字，从不同的方面，勾勒出了十年来《丛刊》版面的基本轮廓。最末一组所介绍的专栏设置的情况，客观上与遇到作家的诞辰、忌日，文学运动、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的多寡有关，又受到来稿所偏重的方面的制约；主观上则体现出刊物的编辑导向——在着重地提倡和推动哪些方面、哪些课题的研究。

从上述统计看米，现代文学研究的选题、范围，以及由此形成的研究工作的基本格局，这十年与过去没有大的差异，呈现出相当稳定的局面。这些年来，不时可以听到革命文学、进步文学受到研究者轻视忽略的议论，我也曾有过类似的担心②。不能排除一时一地，有少数研究者或者若干文章中发生过这尖倾斜，但《丛刊》十年的版面告诉我们，就整体而言，革命文学、进步文学依然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关于它们的思考和探讨，以及由此得出的成果，都明显地多于现代文学的其他组成部分。同样的，与鲁迅研究跌入低谷的忧虑相反，这十年里《丛刊》发表的有关鲁迅的文章达129篇，远远领先于所有其他作家，而且相当于所发表的作家作

① 按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划分，对直接探讨某个历史阶段文学的文章，分类是容易的；对于研究具体作家的文章，当他们是前后经历了好多历史阶段时，分类就较为困难了，有时也就不一定准确和恰当了。

② 参见《现代文学的历史道路和现代作家的历史评价》，载《文艺报》1983年第9期。

品论的五分之一。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这种突出的优势和比重诚然有所减弱，但1986年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丛刊》分两期刊登了10篇文章，从总第31期至第40期的最近10期里，又陆续发表了10篇，绝对数字仍然明显地多于别的作家。对于不同时期文学的研究的多少，是又一个颇多议论的问题。有的同志说：“我一直有一种感觉，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自‘五四’而二十年代，而三十年代，而四十年代，那兴趣和热情，是依次递减的。”^①由于“五四”以来，新文学与人民革命运动的关系呈现出越来越紧密的趋势，这方面的多寡也就很容易被视为革命文学进步文学受到轻视忽略的又一个证据。再加上海外有人认为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进入“凋零期”^②，甚至断言这个时期里唯一可取的，是沦陷区（北平、上海）的少数作家^③；重前期而轻后期，因此更往往被人视为具有强烈政治含义的选择，从而关系到对于这些年来的研究工作的根本导向的估计。然而上述统计表明：近十年里，发表于《丛刊》上的研究第二个十年的文章，其实反略多于第一个十年，如果按上面那位同志的分阶段方法，将“五四”和二十年代分成两个阶段，这种增长就更为明显了。研究第三个十年的文章，虽然比前两段要少，但考虑到这段文学除了《讲话》以后的解放区文学，在五、六十年代曾经有些探讨外，包括《讲话》以前的根据地文学在内，基本上是直到近十年里才受到重视和成为研究对象的^④，能够达到目前这样的规模，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了；也就是说，比之过去，这方面的研究恰巧是在繁荣前进，

① 黄修己：《四十年代文艺研究散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

② 参见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

③ 参见爱德华·冈恩的《被遗忘了的缪斯：1937—1945年间上海和北平的中国文学》。

④ 1988年夏，《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文学书系》（重庆出版社）的出版，被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受到各界的重视，足以说明系统出版这个时期的作品，也是近几年才提上日程的。

而不能说是枯萎萧条。《丛刊》所设立的专栏，纪念“左联”、关于抗战时期文学、纪念《讲话》的，都多于纪念“五四”的，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努力的例证。总之，这些数字大致勾勒出《丛刊》十年版面的概况，也有助于了解近十年来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格局；它们可以作为述评的出发点和依据。

二

对于这些数字所反映的现状，人们会有不同的评价。但对大家说来，首要的任务还在于对何以如此作出科学的说明；唯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此作出切实的评价。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理应受到重视。

一、在客观上，研究工作的选题和范围，总是要受到研究对象本身的制约。这是适用于任何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科的普遍规律。文学研究由于包含了审美的过程，研究者主体的好恶和选择所起的作用，不免要大于其他学科，却仍然不能不受到文学历史本身的内容及其价值的牵制。比如自五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中逐渐地形成了所谓“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提法，特别推崇这六位大师；他们在各种文学史书中占有最多的篇幅，在其他论著中也总是处于明显优势，一直成为研究的“热点”。这既不是哪个权威决定得了的，也并非人们事先商定好了的，而是在于这六位作家的创作成就和贡献值得反复研究，而且也只有充分剖析了他们，才能较好地认识和说明这段文学历史；也就是说，首先是由他们自身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决定的。《丛刊》在这些年里，关于他们的文章多达325篇，相当于全部作家作品论的半数，也是首先由这个客观事实决定的。又比如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个十年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新兴的左翼文学运动迅速成为中国文坛最为活跃的力量，又是世界范围内的“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最有成就

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继承“五四”传统的其他各种文学派别，虽然没有左翼文学那样的巨大变化和形成波澜壮阔的运动，通过不断的创作实践和艺术探索，由幼稚走向成熟，不只在思潮流派方面，而且在文学体裁、个人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多彩多姿的局面。两者都吸引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和注意，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选题。这段文学继续成为研究得最多的任务，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虽然在单个作家的研究中，以文学研究会成员为对象的文章，大多与创造社诸子，在以文学社团、文学流派为对象的文字中，创造社却远远超过了文学研究会。这同样因为文学研究会拥有更多的成员，大多又一直致力于文学事业，著述颇丰；而创造社这个团体及其艺术倾向较为复杂，前后变化很大，人们过去又有更多的误解。所以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同样是与研究对象本身实际情况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的选题、对象和范围，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研究者身上，固然会有这样那样的消长和差异，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在总体上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文学历史本身的客观内容及其价值的制约^①。

二、从主观因素来看，研究课题的选择又总是自觉或者不自

① 这里顺便提供两组数字作为参照：一、由200多位日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组成的中国文艺研究会的会刊《野草》，最初10期的内容，除去一期为综合性的论文汇编外，有鲁迅研究专辑3期，“五四”文学、三十年代文学、解放区文学研究专辑各1期（参见王润华《从国际性的学术期刊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二、在南朝鲜的介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372篇文章中，关于鲁迅的90篇、巴金22篇、胡适17篇、茅盾10篇、老舍9篇、毛泽东8篇、艾青、丁玲各7篇、郭沫若6篇；39篇博士、硕士的学位论文中，鲁迅10篇、茅盾、巴金各3篇、胡适、徐志摩、“五四”文学运动各2篇、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闻一多、老舍、丁玲、赵树理、文艺大众化论争、民族形式讨论各1篇（参见朴宰雨：《国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绍介文献目录(1923.8.—1986.12.)》，载南朝鲜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中国现代文学》创刊号，1987年3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研究方法等都与我们不同，研究的选题和范围却与我们近似。可见这种制约作用何等普遍。

觉地与研究者的观念、方法等分不开的。在各种文体的作品中，《从刊》十年所发表的小说研究的成果，几乎相当于诗歌、戏剧、散文研究的总和。这固然和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数量最多有关，可能与研究者的主观条件关系更为密切。“五四”以来，对于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影响最大的，无论是象泰纳、勃兰兑斯那样的实证主义文学史家，或者象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样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还是象普列汉诺夫、卢那卡尔斯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作家，基本上都更着重于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观察和评价作品的。长期以来，我们自身又形成了逐一地分析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文学语言的程序，并且特别着重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这种研究模式，正好在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的研究中能够得到最为得心应手的运用，同时也妨碍我们对于非叙事类文学和小说以外的作品的研究达到同样的规模和水平^①。这样的观念和方法，还使我们擅长于分析现实主义作品，对于其他思潮流派的文学创作，总不免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也正因为限于这样的主观条件，尽管我们一向按照不同的文学体裁进行研究的，近年来还陆续编写了各种文体的文学史专著，对于各种文体的艺术特征及其演变线索，往往缺少具体细微的分析；大部分文章和著作依旧限于对作品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的考察评价，未能在进行历史分析的同时，展开有关文体的美学探讨。如果说这种限制在文学研究的各门学科都是存在的，由于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学术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也就表现得特别执拗。这是决定研究选题和范

① 当然叙事文学除小说外，还有叙事诗、剧作和报告文学之类的叙事散文。但前者尤其是长篇叙事诗，在整个现代文学中不够发达；戏剧作品所包含的舞台艺术，对于多数的文学研究者又过于陌生；叙事散文缺少大家和名篇，也未能形成历史线索；所以就形成了小说研究特别是长篇小说研究分外繁荣的局面。

围的内在因素。

三、再就学科建设而言。学术研究毕竟不同于时装设计、流行歌曲，一年有一年的款式或者腔调。它的每一个重大变化，都只能是无数次反复的、包括历史的和理论的（在文学研究中还有审美的）论证和分析积累而成的。有的重要发现或者精辟见解，看上去好似天才灵感的产物，其实同样是对于错综复杂的现象和事例经过深思熟虑的剖析、归纳、抽象等过程得出来的。所以学术工作的发展提高，一般说来都是缓慢的、渐进的。象鲁迅研究的成果，至今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数量最多，学术水平最高，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都为其他项目所难以比拟的；象关于第三个十年的研究之所以使人感到比较冷落，从前面的统计看来，与其说是这方面的文章少了，毋宁说主要在于真正有份量的、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成果不多造成的——两者都与研究力量的强弱、有无长期的学术积累密切相关，因此也不是少数人短期内所能改变得了的。再从另一个方面看，这十年里，我们的学科涌动过层层新潮，提出过不少新的命题，但并不是都已开花结果的；它们之能否成立，成为科学的定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推敲和探讨。至于研究格局的变动，更是谈何容易。比如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作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作者是近年崛起的新人，有的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关系近百年文学史研究全局的重大命题的首创者，此书又写于学术界的思想十分活跃的年代里，“广泛吸收了近年来最新的研究成果”，尽量为读者提供“新的知识，新的观念”，也的确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成为一部颇有特色的史书，反映了本学科的最新成就。但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全书总框架未作根本性的变动”^①，事实上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及另外一些重要的思想观念，也未能贯穿

①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后记》。

全书。一部独立的著作尚且如此，更何况整个学科的全局呢！

如果以上各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丛刊》十年的研究课题和范围，从总体上与过去没有很大的变动的事实，就可以理解了。这反映了整个学科的基本面貌和格局，也是符合学术工作的发展规律的。

三

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丛刊》十年发表的文章与过去一模一样，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和新的进展。在这期间，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研究领域的开拓方面，《丛刊》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前面引用过的几个“不仅……，还要……”的原则，表达出推动学科变革的愿望。十年来的版面，大致地反映出这种变化。这既表现在研究的课题和范围有所突破，更表现在对于同样的题目和在原先的范围内，从研究者的角度和方法到研究得出的结论与过去有所不同。

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伟大号召，促使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严肃认真有时也是痛苦的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受到的“左”的干扰特别严重，这样的反思也就开始得格外早些，并且达到相当自觉的程度。对于一系列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历史事件所作的“重新评价”，是这门学科进行反思的最为明确最为普遍的方式，同时也是它开始复苏的一个重要标志。《丛刊》积极地承担起这一学术任务。创刊号上重新把胡适作为“文学革命运动的开拓者”来论证，第2期关于郁达夫是“一个充满矛盾而易遭误解的作家”的估计，都具有“重新评价”的性质。随后的关于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瞿秋白、冯雪峰、胡风、丁玲、戴望舒、路翎等作家，关于茅盾的《幻灭》、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老舍的《猫城记》等作品，关于前期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关于鸳鸯蝴蝶派、新月派、